

# 论邯郸的兴衰

赵九洲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系, 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摘要] 邯郸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极为繁荣, 它的兴衰变化与政治形势、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借助自身固有的优势与特殊的机缘, 邯郸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最终又因政治形势的变化与竞争对手的出现, 邯郸归于默默无闻。

[关键词] 邯郸; 兴衰; 政治形势; 交通; 接力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3.02.016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3)02-0049-05

关于邯郸的兴衰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细加品味, 似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今不揣孤陋, 特撰此文再做探讨,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一、邯郸的兴衰概况

### (一) 邯郸崛起的背景

邯郸的建城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商代曾先后定都邢(耿)、殷, 邯郸长时间内为畿辅之地, 建城当不晚于商代晚期。春秋时期为晋国重要城邑, 后赵鞅击败赵午、赵稷父子夺得邯郸, 时在公元前490年。邯郸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但地位似乎仍不及晋阳, 故而形势危急时赵襄子北奔晋阳坚守而非东入邯郸, 终靠晋阳一战而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此后, 赵之统治中心似先后在晋阳、耿与中牟三者之间摇摆, 百余年间邯郸并未显得十分重要。但就在定都中牟三十多年后, 赵敬侯把都城迁到了邯郸, 时为公元前386年。邯郸飞跃发展的契机到来了, 从此一步步地成长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那么赵氏政权最终为什么要以邯郸为都呢? 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 定都之前邯郸的经济状况即较晋国其他城市为好, 此为赵国定都邯郸的重要原因。史载:

襄子出曰: “吾何走乎?” 从者曰: “长子近且城厚完。” 襄子曰: “民疲力以完之, 又弊死以守之。其谁与我?” 从者曰: “邯郸之仓库实。” 襄子曰: “浚民之膏泽以实之, 又因而杀之, 其谁与我? 其晋阳乎! 先主之所属也, 尹铎之所宽也, 民必和矣。” [1](卷15《晋语九》, P504)

我们注意到赵襄子随从指出的邯郸的特点是府库充实, 虽然赵襄子以官员“浚民之膏泽”而民不归附为不入据邯郸的理由, 但上距赵氏夺邯郸方三十余年, 因两次攻邯郸多所杀伤而结怨于民恐怕才

是最主要的原因。不管如何, 还是可以据此窥测出其地富庶状况之一斑的。到赵敬侯时, 邯郸之役已过去百余年, 民众怨气不复存在; 复经赵氏子孙多年经营, 经济优势更为显著, 遂可从容移都。

其二, 邯郸西靠太行以为屏障, 周围又有沁河、渚河、滏阳河等河水环绕, 东面是沼泽湖泊密布的低地平原, 形势极为险要。此外, 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纵贯全城, 而城西南的滏口隘又为穿越太行山进入山西高地的通道, 这样邯郸又成为南北与东西交通的交汇点。易守难攻又交通便利, 邯郸自然为都城的理想所在。故而顾祖禹对邯郸赞誉有加:

地险说曰: “邯郸包络漳滏倚阻太行, 赵人都此。秦魏战其西南, 燕齐战其东北, 而赵之力常足以却秦胜魏, 翦齐弱燕。苏秦谓山东之国莫强于赵者, 岂非拥据河山, 控带雄胜, 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哉?” [2](卷17《北直六·广平府》, P674)

其三, 列国纷争的态势促成了邯郸的崛起。终战国之世, 争夺中心在大河之南北, 故而若定都晋阳常有鞭长莫及之感, 而以中牟为都则紧邻魏境而随时有兵临城下的危险, 邯郸的位置显然较为适中, 退可守进可攻, 北上、南下、东出都很便利, 自然成为赵国的最佳都城选址。

其四, 邯郸可能本是赵敬侯之势力范围。按照先秦之惯例, 则赵氏子孙当各有自己之食邑, 赵献侯即位即都中牟, 而赵敬侯之元年又移都邯郸, 颇疑中牟、邯郸原即分别是献侯、敬侯的食邑所在。赵国王位继承制度颇多缺陷, 故而每逢新君即位多有宗室叛乱发生, 如襄子死后有桓子与献侯之争, 武公死后有敬侯与赵朝之争<sup>[3](P177-178)</sup>。在政局风雨飘摇的情形下, 即位后都城选在自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显然比旧势力盘根错节的旧都为好。若上述猜测成立的话, 则定都邯郸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总之, 赵氏家族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之后, 把都城最终选定在了邯郸。从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

[投稿日期] 2012-11-20

[作者简介] 赵九洲(1980-), 男, 河北武安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

年)起到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破城止,赵都一直稳定在邯郸而再未迁移,前后持续158年之久,这为邯郸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而都城的稳定繁荣,也是赵国日趋强盛的重要条件。战国谋士规划列国军事态势时,无不提及邯郸,邯郸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仅关乎赵国之兴亡,亦与天下大势去否有密切之联系。故而长平战后邯郸保卫战牵动了所有国家的神经,最后秦军因内外夹攻而功败垂成,秦统一大业因而推迟了近四十年。

## (二) 邯郸的繁荣

战国时期的邯郸无疑是极为繁华的,惜乎史书中均无明确的记载,司马迁也只是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sup>[4](P3264)</sup>好在有考古资料可以参考,据发掘报告可知,战国邯郸城包括大北城和王城两部分,周长分别为15千米和9千米,总面积为18.879平方千米,大小与列国都城相比,并不逊色<sup>[5]</sup>。如秦都咸阳面积可能在12-14平方千米之间<sup>[6]</sup>,齐都临淄大小城周长分别为14千米和7千米<sup>[7](P272)</sup>。据学者估测,战国时期邯郸人口当在30-40万之间<sup>[8]</sup>。此外邯郸历为大商贾集中之地,如郭纵、卓氏皆为出自邯郸的大富豪,而吕不韦也是贾于邯郸而发现异人奇货可居,亦可想见商业之发达状况。

此外,还有一些材料可间接证明邯郸之繁荣。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平定天下后,曾徙六国富豪十二万户于长安<sup>[4](卷6《秦始皇本纪》P239)</sup>,出自邯郸者当为数不少,此为对邯郸的第一次打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章邯袭破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sup>[4](卷89《张耳陈余列传》P2578)</sup>,则为对邯郸之第二次打击。经此两次重创,至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伐陈豨,犹言:“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sup>[4](93《韩信卢绾列传》,P2640)</sup>没有据守迭遭摧残的邯郸成为陈豨失败的重要原因,则其地旧有经济、军事基础之雄厚亦可想见。

## (三) 邯郸的衰落

两汉之际,天下鼎沸,光武帝北走河北,困于王郎,邯郸之役实为其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阵仗,克邯郸而河北遂定,卒南向而取天下,顾祖禹评论道“光复大业肇于邯郸”<sup>[2](卷17《北直六·广平府》,P674)</sup>,又足见邯郸地位之重要。但这大概也是古城邯郸最后一次大放光芒了,翻检《后汉书》,与邯郸有关的记载多是关于光武君臣攻邯郸之事,自此以后以迄汉末,邯郸再无关乎全国局势之重要事迹。至汉献帝初平二年袁绍夺取邺城作为统治中心,邯郸则非其所措意者。显然此时邯郸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心城市的资

格,沦为普通一县。至建安十七年遂有魏郡兼并邯郸之事<sup>[9](卷110《郡国志二》注,P3431)</sup>。

此后邯郸一直到清末均未再现赵都之辉煌,明清时期县城极为狭窄,成化以前“南不过斜街口,北不出观音阁,长不及二里,宽仅半里”,成化时有所拓展也不过是“于城南北两端拓半里有余”<sup>[10](卷首,P78)</sup>,可谓荒残已甚,不惟无法与昔年之赵都相比,就是与普通县城相比亦太过狭小简陋。

## 二、政治形势与邯郸兴衰

### (一) 都城地位与邯郸的兴衰

从外界获取资源是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本,不管在传统时代还是工业时代,这种输血功能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输血量,城市就可以繁荣;输血量小,城市就萧条。输血功能由政府的强制力与超经济剥削功能来确保,而输血量的大与小,则由城市的等级地位决定。

有学者认为“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等级系统的形成有较深厚的历史根源,由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单一小农经济基础之中,政治军事因素对城市等级的制约力非常强”<sup>[11](P659)</sup>,而城市等级又对城市的繁荣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就邯郸的兴衰来看,政治因素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故而,都城地位得失直接决定了邯郸的兴衰。

邯郸之所以能够繁荣,与其作为赵国都城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邯郸在战国时拥有的广袤经济腹地,史书中对赵国辖地曾有明确记载:

赵地,昴、毕之分壑。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鄆、州乡。东有广平、钜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sup>[12](卷28下《地理志下》,P1655)</sup>

据河北、河东广袤之土地,以全国之力以奉养都城,再加以自身数百年发展积淀之雄厚基础,邯郸怎能不兴旺呢?

终西汉之世,邯郸依旧十分繁荣,史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sup>[12](卷24下《食货志下》,P1180)</sup>邯郸显然得与长安、洛阳、临淄、宛、程度并列为全国六个最大的都市,且是河北唯一的超级都市,其时邯郸仍为区域中心城市自不待言。

而邯郸之所以会衰落,也与其失去都城地位且政治等级不断下降有关。成为山东强国赵国的首都是邯郸之大幸,也是其大不幸。邯郸衰落的诱因在其成为赵都之时即已经悄然种下了。邯郸经过赵国

多年经营，雄踞河北，存在强大的割据潜力。战国谋士规划列国军事态势时，无不提及邯郸，邯郸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仅关乎赵国之兴亡，亦与天下大势去否有密切之联系。秦末，武臣甫下邯郸即可脱离陈胜自立为王而陈胜亦无可奈何<sup>[4]</sup>(卷89《张耳陈余列传》)，陈豨叛乱而汉高祖有“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sup>[4]</sup>(卷8《高祖本纪》，P388)之语，汉初复有赵王据邯郸而参与七国之乱，两汉之际王郎据邯郸而“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sup>[9]</sup>(卷12《王昌传》，P492)，种种变故必然给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而秦汉两代中央政府均对邯郸加以抑制，此为邯郸盛极而衰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百余年赵都历史的影响，后来汉魏的赵王也往往封于邯郸，这样邯郸虽仍有赵都之名份，却再无昔日之荣光。因为中央政府必然要限制封国的规模，以免尾大不掉。汉高祖初封之赵国疆域或许还颇为可观，但景帝时赵国卷入七国之乱，朝廷对的赵国的猜忌遂变本加厉。汉高祖虽有削弱邯郸之举，但封爰子为赵王，赵国之辖地当仍颇为可观。至景帝，先削掉了赵之常山郡，赵王遂极为不满，于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卷入了七国之乱，乱平后刘遂自杀，朝廷对的赵国的猜忌遂变本加厉，景帝先废赵国为邯郸郡，两年后又改封彭祖为赵王，此时赵国辖地当已只剩邯郸一郡之地。武帝时复有自赵国析置平干国之举，西汉后期赵国统县四，有户84220，口349952<sup>[12]</sup>(卷28下《地理志下》，P1630-1631)。东汉之赵国则辖五城，有户32719，口188381<sup>[9]</sup>(卷110《郡国志二》，P3437)。

这样赵国的管辖区域不惟与昔日之赵国不可同日而语，亦且不及普通一郡的规模，与邺城所在之魏郡的“户二十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万九千六百五十五。县十八”<sup>[12]</sup>(卷28上《地理志上》，P1573-1574)或“十五城，户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万五千六百六”<sup>[9]</sup>(卷110《郡国志二》，P3431)也相差甚远。同时，由于王国的特殊性，邯郸也与州治无缘。一代名都失去了广袤的腹地，已经只能苟延残喘了。

至东汉末年，邯郸复丢掉封国都城之地位。此后一直到民国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其政治地位一直为普通县城，自然也就难以再现昔日的繁华了。晚近邯郸的复兴，也与其重获区域中心城市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就不过多展开了。

## （二）邯郸没落的关节点

那么邯郸又是何时开始衰落的呢？学者多认为就在汉末，但详考史书，不管是黄巾之乱还是后来的群雄讨董卓，邯郸均非兵家争夺的要地。汉末张角等人在起义前的战略安排是“先收荆、杨数万人，

期会发于邺”<sup>[9]</sup>(卷71《皇甫嵩传》，P2299)，冀州黄巾军血战广宗与下曲阳，邯郸方面不闻有重要战事，则可见其时邺城地位已然十分重要而邯郸早已衰落。仔细玩味邯郸之衰落过程，似乎东汉末年的兵燹与灾荒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邯郸衰落始于东汉之初而非东汉之末。两汉之际是邯郸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捩点，而光武帝则要为其衰落负主要责任。

光武自更始二年（24年）四月围城起至五月方才攻克，前后达一月之久，城池之破坏必然极为严重，史书中虽无明确的记载，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史载“因攻城邑，遂屠邯郸”<sup>[9]</sup>(卷21《任光传》，P752)，方志中又称：“王郎城在邯郸县西，县志：‘光武斩王郎，平其城。’在城西三里许，故址犹存。”<sup>[13]</sup>(卷54《古迹·广平府》P250)则邯郸城破后光武帝有进一步破坏之举动，故老相传的王郎城，就是为光武帝所毁弃之城池。一年之后光武选择的登基之地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鄆（今河北省高邑县）而不是声名赫赫的邯郸，虽说急于称帝不必一定要选择名都大邑，但恐亦与邯郸荒残太甚不无关系。到天下平定之后，邯郸的规模应该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从光武帝的心理层面来考量，其统一天下最艰难的战役发生在邯郸。王郎占据邯郸长达五月之久，邯郸的险固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王郎与刘林在邯郸稍作号召，“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sup>[9]</sup>(卷12《王昌传》，P492)，则邯郸在河北地区的影响力亦必使他难以忘怀。定都河南后势必要对邯郸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以削弱其根基，不然以后明帝、章帝均行幸邺甚而召赵王来会却不闻有邯郸之行这样的事情是绝难想象的<sup>[9]</sup>(卷2《显宗孝明帝纪》，P108；卷3《肃宗孝章帝纪》，P143)，而天下五都之一的邯郸至汉末而竟被邺城所在的魏郡吞并更是不可思议。

此外从赵王的分封上，也能看出光武帝的用心。西汉初年之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皆汉高祖之子，自赵敬肃王彭祖之后至王莽时历代赵王则皆汉景帝之后。东汉赵王却并不是光武帝的嫡系子孙，这一点与西汉大异其趣。建武五年，光武帝将赵国封给了其叔父刘良，此后历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汉末，至建安十八年（213年）改封而止<sup>[9]</sup>(卷9《孝献帝纪》：“徙赵王珪为博陵王。”P387)。与帝系的疏远也决定了东汉赵王地位较低，这从史书中记载东汉诸王朝见皇帝时赵王的位次极为靠后也可以看出来，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列王的序次是“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赵王盱”<sup>[9]</sup>(卷1下《光武帝纪下》，P81)，赵位列最后。而永平六年（公元63年），入朝列王的序次则是“沛王辅、楚王英、东平王苍、

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赵王盱、北海王兴、齐王石”<sup>[9]</sup>(卷2《显宗孝明帝纪》, P109), 赵也在倒数之列。此后, 赵国、赵王、邯郸三者实际上均已成为了单纯的政治花瓶, 除了作为赵王的封地外, 再无其他重要功用, 历代赵王的“墓”成了邯郸在光武以后整个东汉时期赵国最重要的事迹。

这样, 邯郸城池受到摧残和限制, 赵国地位又颇遭压抑, 衰落就在所难免了。故而终东汉之世, 邯郸再无作为。

总之, 笔者以为, 邯郸衰落于两汉之际而非两汉之末, 光武帝的政治策略在邯郸的衰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交通条件与城市接力

#### (一) 交通条件与邯郸的兴衰

正如前文所述, 获取资源的能力对城市有重要影响。而资源输血功能的强弱除与政治决策密不可分外, 也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

邯郸的兴起, 与其便利的陆路交通有关, 相关材料已见前文, 此处不赘。而邯郸的衰落, 则与陆运与水运两种交通方式的竞争有关。邯郸劣势在于不具备便利的航运条件, 邯郸虽有几条河流环绕, 但水量均不大, 水运并不发达, 故赵武灵王称: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 与齐、中山同之, 而无舟楫之用。”<sup>[14]</sup>(卷19《赵二》, P967)后虽建造舟楫也多在东部边界之地, 主要出于军事目的。翻检史书, 不仅未发现邯郸有舟船水运的相关记载, 也没有找到建造水利工程的有关事例, 大致可以断定, 远在战国时期邯郸即缺乏发展水运的自然条件。这样, 邯郸虽然控扼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陆路要冲, 但由于难以通航,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物资与人员的流动日益频繁, 水运相对于陆运的巨大优势日益凸显出来, 邯郸的交通条件逐渐成为其长远发展的瓶颈, 一个拥有优良水运条件的城市乘机崛起取而代之也就不可避免了, 把握住机会迅速崛起的是邺城。

#### (二) 以城制城与邯郸的衰落

古来因故而衰落的都市很多, 但衰落之后大多仍能迅速恢复元气, 再不然也能坐拥中心城市的位置。像邯郸这样一路下坡, 从都市变为普通县城的, 非常罕见。并不是邯郸的生命力不如长安、洛阳、南京等城市, 而是由于其周边有城市为其接力使然。

冀南区域一直是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所在, 也一直对河北乃至全国有重大之影响。凭依这一地区, 邯郸、邺城、魏州相继兴起。但是, 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三者所依托的经济

腹地本就是重合的, 且属于同一地貌单元, 本就是一块完整的区域, 故而在如此狭小三角区域里显然不可能同时出现数个大都市。历史上三者也确实没有同时雄居河北, 而是依次坐庄, 构成了历史上独特的区域城市竞争现象。邯郸的没落使得邺城得以崛起, 而邺城的残破又为魏州的崛起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

邺城在邯郸的衰落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央政府对邯郸的防范与打压借助以邺制邯的战略来实现, 下面简要分析一下这一战略实施的大致情形。

首先, 邺城是钳制邯郸的不二人选, 环顾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冀南地区, 除邯郸而外, 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与邺城在政治和经济上相提并论<sup>11</sup>。战国时期, 西门豹、史起先后治理邺城, 都大兴水利, 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 引河水灌民田”<sup>[4]</sup>(卷126《滑稽列传》, P3213), 史起也引漳水溉邺, 从而使得邺地“终古舄鹵兮生稻粱”<sup>[12]</sup>(卷29《沟洫志》, P1677), 邺城经济之富庶, 在两汉时期河北地区仅次于邯郸, 为其他城市所不及。

其次, 以邺制邯有其历史渊源, 邺城较早就是以与邯郸竞争者的形象出现的。如前文所述, 邺城所处区域位置极为重要, 军事意义非同凡响, 不惟决定河北地区安危, 亦且可以牵动河南中原腹里的政治局势。战国时期因邺为魏国所有而赵都颇受威胁, 以至有邯郸为魏军攻破并被占据两年之事<sup>[4]</sup>(卷43《赵世家》, P1801)。赵之发展亦颇受邺之掣肘, 故而赵不得不在古漳水北岸构筑一道长城来防御来自邺城方面的军事威胁<sup>[15]</sup>。战国后期秦攻赵亦多先据漳、邺, 如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攻赵, “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 取九城”; 十五年再攻赵, “大兴兵, 一军至邺, 一军至太原, 取狼孟”<sup>[4]</sup>(卷6《秦始皇本纪》, P231、P232); 十八年发动灭赵之战, “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sup>[4]</sup>(卷86《刺客列传》, P2531)。邺之向背与赵之安危休戚相关, 以邺制邯态势已然形成。

最后, 自汉高祖中经景帝以迄光武帝, 以邺制邯策略一步步展开, 最终使得二者的主客之位完全逆转。至曹操把邯郸并入魏郡, 邺城遂正是成为冀南的中心城市, 前后达三百多年。邺城衰落而魏州兴起。这样由于有生力军接力, 遂扼杀了邯郸复兴的机会,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 至晚近才获得了重新上升的机会。

综上, 本文分别探讨了邯郸的兴衰脉络、政治形势变化对邯郸的影响、水运条件与城市接力对邯郸的影响等几个问题, 试着对邯郸的兴衰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研究邯郸的兴衰, 可以更好地理解先秦至两汉冀南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脉络, 对于我们把握数百年间全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不无裨益。

## 注释：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见《史记》卷 3《殷本纪》，第 105 页。

《史记》卷 43《赵世家》：“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见第 1792 页。另参见《左传》哀公五年。

《史记》卷 43《赵世家》：“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则都中牟自此始，时为公元前 423 年。此前似乎曾以耿为都，故而《史记集解》引《地理志》称：“河南中牟县，赵献侯自耿徙此。”见第 1796 页。耿与中牟的确切所在，以及晋阳是否为都，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史记》卷 43《赵世家》：“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见第 1798 页。

关于邯郸地理位置与城址，侯仁之先生有详细研究，见《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赵、魏态势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1 册《诸侯称雄形势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34 页。

《资治通鉴》卷 1 胡注：“若敬侯已都邯郸，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郸，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见第 11 页）则认为邯郸之为都城要晚数十年。《读史方舆纪要》卷 17《北直六·广平府》下邯郸县邯郸城条有类似观点。司马光对此比较审慎，周安王十六年（前 386 年）条下未明言赵移都邯郸。但《史记》中却有明确记载，单凭都城沦陷而国不灭亡推测未都邯郸似不足为训。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 35：“吴人入郢而楚不亡，燕人复齐而齐不亡，又何疑于赵？”反驳颇有力度，笔者仍持敬侯迁都说。

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记载颇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详见《后汉书》卷 74《袁绍传》，另可参见《三国志》卷 6《魏书·袁绍传》。

此似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如侯仁之：《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郝良真、姜春：《论古城邯郸的

重要历史文化地位》，《文物春秋》1992 年第 1 期；孙继民、郝良真：《西汉邯郸经济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杨震、齐军：《邯郸城市的变迁》，《城建档案》2007 年第 2 期。笔者所见持此观点的文章还有多篇，不再一一列举。

11 关于邺城的兴起过程，邹逸麟也有较详细探讨，极有见地。可参看《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载《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77-387 页。不过邹先生只就邺城本身而论，未从邯郸与邺城的相互关系着手分析，笔者尝试在这一方面稍作拓展。

## 参考文献：

- [1] 左丘明.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 沈长云. 等. 赵国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A]. 《考古学集刊》第 4 辑[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6] 张沛. 古咸阳城考[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3).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8] 孙继民、郝良真. 西汉邯郸经济试探[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1).
- [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 李世昌. 等. 民国邯郸县志[M]. 《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188 号，第 1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
- [11] 李孝聪. 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城市的形成[A].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3] 李卫. 等. 雍正畿辅通志[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05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4] 诸祖耿. 战国策集注会考[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 [15] 杨英法. 等. 赵长城古今考辨[J].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 (1):50-51.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A research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dan

ZHAO Jiu-zhou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Shijiazhuang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Abstract:** Handan was very prosperous for a long time in history. Its rise and fall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natural conditions. With its own inherent advantages and special occasions, Handan went to the front of history. At last, because of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etitors, Handan declined.

**Key words:** Handan; rise and fall; political situation; traffic; relay